

姓 名 : 陈媛媛（中山大学博士研究生在读）
所 属 机 构 :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人类学专业
参 加 项 目 : 博士生论文竞赛
邮 寄 地 址 :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新港西路 135 号中山
大学 364 栋 7 楼
电 子 邮 件 : 1005311164@qq.com
推 荐 人 姓 名 : 周大鸣教授
推荐人电子邮件: hsszdm@mail.sysu.edu.cn

推荐信

陈媛媛同学本科学习社会学专业，有社会学专业知识以及定量研究方法的学术背景，硕士、博士跟随我学习人类学专业，有扎实的人类学知识背景，并得到多次田野工作训练，有较夯实的田野工作基础。该生的优势在于：一方面，能够将社会学与人类学的理论方法相结合展开研究；另一方面她能够把理论与田野实践相结合。就其本人而言，对学术研究深感兴趣，愿意钻研，态度认真，有一定的理论野心。

此篇文章是该生于 2015 年 7、8 月份间对佛山西樵镇民乐展开一个多月的田野工作的成果。在田野工作之前，该生已阅读了大量相关文献并与我数次沟通，带着一定的研究目的与研究计划进入田野，田野中每日记录田野笔记，资料颇丰，田野归来，经过数月整理形成田野报告，又几经修改、反复斟酌，完成此篇文章。此文章与我研究的珠三角本地人与外来人口形成的“二元社区”研究进行对话，我的研究指出：在同一社区，外来人与本地人在分配、就业、地位、居住上形成不同的体系，以至心理上形成互不认同，构成“二元社区”。而此篇文章，探讨的背景是，改革开放后自发形成的遍地开花、自下而上的城市中心，在几十年的变迁中出现了完全不同的城市化结果，除了都市的类型，还存在“村中城格局”，即地处珠三角都市圈各大城市连接地带的被‘村’包围的‘城’，也即很多村落内或邻近村落间围绕特定市场和产业自发形成‘城’，由此构成‘村’包围‘城’的空间格局。改革开放后，因社会变迁、制度性安排、城市规划等因素这类地区从原有的城市中心变为边缘地带。在此边缘地带，经过产业升级以及城市化模式转变，出现了稳定的外来人口规模以及地方化经济网络，并且出现了区别于都市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形成的“二元社区”的融合状态。此个案可以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移民城市中外来人口与本地人之间从“二元”到“融合”的可能路径，并且在社会结构转型上具有示范意义。

无疑，此文章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以及实践意义，能够与我研究的珠三角都市化过程中形成的“二元社区”进行对话，颇具理论价值，值得探讨，并且紧扣此次会议的研究主题。另外，该生踏实努力，刻苦勤奋，热爱人类学专业，推荐其参加此次会议。

推荐人：

2015 年 12 月 28 日



从“二元”到“融合”——西樵民乐外来人口融合问题的个案研究

(陈媛媛)

摘要：笔者以广东南海西樵民乐为个案，对地处城市圈连接地带的外来人口适应情况进行了研究。指出民乐外来人口能够很好地融入当地。经济融合层面，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共同形成本地化的经济网络，互为服务、彼此需要；空间与定居融合上，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使其具有可能性。且本地人与外来人口之间的差异逐渐缩小，从原本制度性差异、社会分层差异逐渐向仅存在因地域造成的身份差异转变，而定居的增多甚至逐渐减少了这种身份差距。此个案可以促使进一步思考移民城市中外来人口与本地人之间形成的“二元社区”走向“融合”的可能路径，并且在社会结构转型上具有示范意义。

关键词：民乐； 外来人口； 本地人； 二元社区； 融合

From “Dual Community” to “Integration” —— A Case Study on the Integration Issue Among Migrants in Minle of Xiqiao Town

(CHEN Yuan-yuan)

Abstract: Based upon the case study on Minle of Xiqiao Town of Foshan, Guangdong Province, this paper tries to analyze the adaptation conditions of migrants who are living at the connection areas between the megacities. 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migrants in Minle are able to be well integrated into the local society. In the perspective of economic integration, migrants together with local people gradually form localized economic net, where they serve each other and they need each oth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usion of space and settlement, a variety of factors work together to make it possible. Moreover,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local people and the migrants is gradually narrowing, which is changing from past institutional differences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difference to only identity difference caused by regional factor. However, the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settlements has reduced the identity differences. Overall, this case can be prompted to further think about that migrants and local people in migrant cities are possible from "dual community" to

"integration". Furthermore, this case has demonstration significance from the view of social change.

Key Words: Minle; Migrants; Local people; Dual community; Integration;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长三角等沿海发达地区工业化、城市化发展速度极快。伴随就地工业化、乡村都市化进程,农村逐步发展为小城镇、城市中心,一股强大的拉力将省内以及全国各地农村劳动力转移到这部分地区,由此开始了大范围的人口迁移。基于城市外来人口规模之大、影响范围之广,其社会融合问题逐渐成为关注的焦点。

首先,就“二元社区”问题。学者主要认为外来人口首先遭遇制度性排斥,此外在分配、居住、消费等方面也存在本地人与外来人口之间形成的二元社区。这是因为“不合理的制度安排,使某些社会群体获得更多的牟利机会,更多地福利待遇。而另一部分人却陷入制度的贫困”。¹周大鸣教授通过对珠江三角洲外来人口与本地人的研究,提出“二元社区”的新概念。认为“所谓二元社区即指在现有户籍制度下,在同一社区(如一个村落和集镇)外来人与本地人在分配、就业、地位、居住上形成不同的体系,以至心理上形成互不认同。”并从分配制度、职业分布、消费娱乐、聚居方式和社会心理五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将本地人和外来人口形成的两个不同系统称为“二元社区”,最终提出了“二元社区”形成的原因以及可能引发的问题。²

其次,就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合问题。学者认为主要存在融合困难、浅层融合、存在障碍等问题。周大鸣教授认为城市新移民的适应与融合存在诸多主客观难题。³另外,周教授指出国际移民中存在浅层融合与深度区隔的社会融合问题。⁴学者李培林运用社科院中国社会状况综合数据,描述并分析了老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合问题,重点考察了经济、社会、心理和身份四个层面的融合状况。⁵朱力从经济、社会、心理三个层次对农民工适应情况进行了分层研究,

¹ 仲大军. 国民待遇不平等审视——二元结构下的中国[M].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2.

² 周大鸣. 外来人口与“二元社区”——珠江三角洲的考察[J]. 中山大学学报, 2000(2).

³ 周大鸣. 城市新移民问题及其对策研究[M].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4.5.

⁴ 周大鸣 杨小柳. 浅层融合与深度区隔[J]. 民族研究, 2014(2).

⁵ 李培林. 中国农民工社会融合的代际比较[J]. 社会:2012.5(32).

认为制度和政策是阻碍农民工进一步适应的主要因素。⁶崔岩主要从心理角度对社会融合以及身份认同进行了测量与分析,认为社会歧视、社会排斥是影响融合的重要原因。⁷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虽然在地域上有着较强的归属感,但却在群体上归属感较弱。⁸张文宏将心理、文化、身份与经济四个部分进行定量分析,数据得出总体社会融合程度低的结论。⁹

最后,就市民化问题以及定居问题。外来人口市民化问题存在困难,只能渐进式进行,需要漫长过程。张斐对外来人口市民化道路上的现状及其影响作了主客观上的分析。¹⁰吴文恒讲到人口市民化的阶段性特征,认为市民化的过程应当具有渐进性,切忌盲目、虚假。¹¹此外,诸多学者认为外来人口对于城市定居的向往与现实之前存在着矛盾。叶鹏飞基于七省调查数据展开的实证分析,证明了渴望定居,但却因市场、文化心理、制度因素而望而却步的现实。¹²

综上所述,当前学者对都市外来人口融合问题有三个初步判断:第一,本地人与外来人口之间存在着难以逾越的分配、消费、居住区隔,形成显著的二元社区。第二,在外来人口社会融合问题上,表现为融合困难、深度区隔、融合障碍等特征。第三,在市民化问题上,市民化道路着实是一个漫长过程,需循序渐进。

基于上述研究,其研究载体主要是都市,外来人口受到都市政策、文化的影响,有其特殊性。笔者注意到改革开放后自发形成的遍地开花、自下而上的城市中心,在几十年的变迁中出现了完全不同的城市化结果,除了上述都市的类型,还存在“村中城格局”,即“地处珠三角都市圈各大城市连接地带的被‘村’包围的‘城’,也即很多村落内或邻近村落间围绕特定市场和产业自发形成‘城’,由此构成‘村’包围‘城’的空间格局”。¹³改革开放后的发展中因社会变迁、制度性安排、城市规划等因素从原有的城市中心变为边缘地带。却在这样的边缘地带,经过变迁出现了稳定的外来人口规模以及地方化经济网络,并且出现了区别于都市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形成的“二元社区”的融合状态。由此,本文以民乐为例探讨村中城里外来人口从“二元”到“融合”的可能路径。

⁶ 朱力. 论农民工阶层的城市适应[J]. 江海学刊, 2002 (6)

⁷ 崔岩. 流动人口心理层面的社会融合和身份认同问题研究[J]. 社会学研究 2012(5).

⁸ 米庆成. 进城农民工城市归属感问题探析[J]. 青年研究, 2000 (4) .

⁹ 张文宏 等. 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合的结构、现状与影响因素分析[J]. 社会学研究, 2008 (5) .

¹⁰ 张斐.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J]. 人口研究, 2011, 35 (6) ..

¹¹ 吴文恒. 中国渐进式人口市民化的政策实践与启示[J]. 人口研究, 2015,39(3).

¹² 叶鹏飞. 农民工的城市定居意愿研究——基于七省(区)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J]. 社会, 2011(2).

¹³ 杨小柳. 村中城: 一种半城市化类型的研究[J]. (Working paper)

二、民乐外来人口人口迁移过程

本文的田野点是广东南海西樵镇的民乐。西樵镇位于广东省南海区边缘地带西南部，是珠江三角洲腹地之一，东濒北江顺德水道，与南庄镇隔江相望；南与九江镇相接壤；西与高明相连；背与丹灶镇和三水市白坭镇为邻。¹⁴东距佛山 27 公里，距广州 45 公里。西樵素有“广纱甲天下，丝绸誉神州”之美誉，是中国面料名镇、中国纺织之乡，是“南海西樵山遗址文化”的发源地。民乐位于南海区西樵镇北部，距离西樵镇官山城区 4 公里，也属于西樵镇的边缘地带，行政区划上包括樵乐社区和民乐社区。樵乐社区前身是民乐城区、民乐社区，2008 年 1 月经南海区人民政府批准更名为樵乐社区居委会，成立中共西樵镇樵乐社区党总支部。樵乐社区位于西樵镇中心地区，周边与民乐社区、联新社区、西樵社区、百东社区相邻，面积 2 平方公里，截至 2015 年 8 月初，社区常住总人口 7677 人，户籍人口 6211 人，流动人口 1466 人，经济以商业为主，社区内有商业店铺近 1000 家，是邻近社区的商业集散地。民乐社区原名为民乐村委会，于 2011 年 3 月年实行“村改居”。面积为 5.8 平方公里，辖下有 14 条自然村、18 个管理小组。民乐社区户籍人口近 8000 人，流动人口近 11000 人。综上，在整个民乐，散落着共计 12000 多外来人口，占民乐总人口的 47%。

民乐生活着近半数的外来人口，从进入、人数激增、波动再到稳定的过程与当地的丝织业有着密切的关系，主要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改革开放后至 90 年代末期，民乐成为输入地阶段。丝织业作为支柱产业，所占当地总产业份额比重极大，高达近 90%。民乐丝织业有着重要的桑基鱼塘、重工商传统等历史原因，民乐 1974 年建立国营企业，如火如荼，然而在改革开放后，国营企业弊端暴露无遗：体制变革、经营管理问题，加之市场变化巨大、水运交通优势不再、原材料生产萎缩等因素，日渐惨淡。与此同时，私人企业、家庭作坊开始大量兴起，鼎盛阶段要数 80 年代中期至 90 年代中期，多达 800 余家。遍地开花的纺织业，产生了对外来人口的需求，民乐出现了当地人所说的“一车一车的外来人口来到民乐”的情景。自此，民乐成为外来人口输入地，外来人口出现了从无到有、人数剧增的情况，十几年间共计涌入 12000 余人。

第二阶段是 2000 年后的十年，是产业调整，外来人口数量波动、生计转型

¹⁵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南海市西樵山旅游度假区志》，广东省出版集团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

的阶段。从产业上来看，第二产业占总产业份额自 2000 年开始逐年减少、工厂数量也骤减；从外来人口数量上看，2004 年外来人口数量达到最高峰，16000 人左右，但随后的五六年中，人数逐渐减少至 12000 多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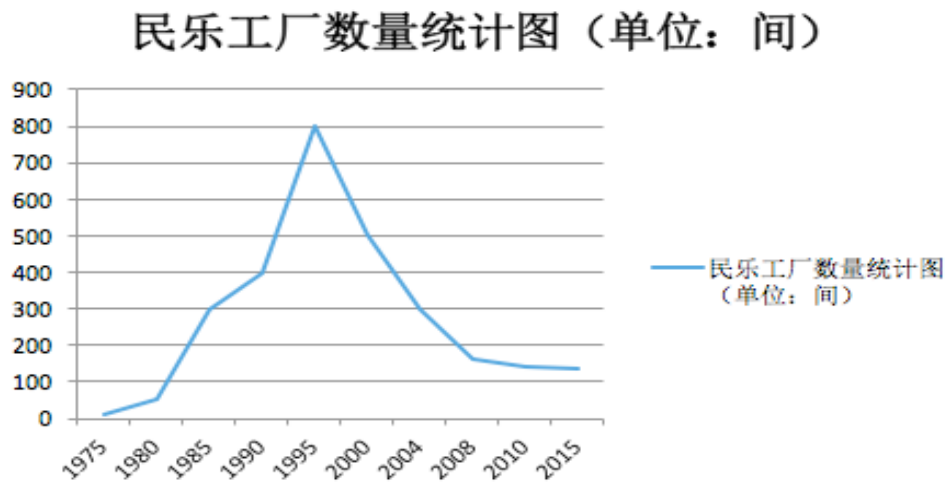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民乐已经成为全国主要的纺织品生产和销售基地。但是，随着国内、国际市场环境的变化，纺织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竞争压力相当大，纺织业的传统优势逐渐减弱，纺织业的发展面临了诸多问题：缺乏自主开发创新能力、国内纺织品低档产品供过于求、受到国际市场反倾销影响。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民乐纺织业市场占有率不断下降、产量不断减少，大量手工作坊、企业只能通过关闭、转产、合并等形式继续存在。由此，民乐开发区应运而生，成为民乐支柱产业重组、发展的转折点。于 1998 年由民乐社区和下辖的七个村小组（隔涌、北塍、伊洛，福地，和平，海边和原望）共同开发了民乐开发区，由民乐社区组织，七个村小组出土地。2000 年民乐开发区的建成有着划时代的意义，产业升级后较大的纺织厂都搬迁至此。民乐纺织业经过 90 年代末以及 2000 年初的淘汰、更新升级，在大浪淘沙之后剩下的都是颇具规模以及有实力的厂，截至 2008 年，纺织厂数量从 800 多家缩减到 100 多家。同时，民乐外来人口数量减少、面临生计转型。

第三阶段是自 2010 年至今，是民乐总产值稳步升高，外来人口流动进入稳定阶段。从产业上看，民乐总产值年年增加，三大产业产值也分别逐步增加，工厂数量与规模也保持稳定态势。从外来人口数量上看，自 2010 年开始，人口数量稳定在 12500 人左右，近五年来，流动率相对稳定。

目前，民乐工厂主要以纺织厂为主，兼有家具厂、建材厂等。民乐开发区的厂占民乐总产值的 90%。现共计有 14 家标准化厂，其余普通工厂有二十余家。此外，在民乐开发区之外的十四条村中，仍然散落着大大小小近一百个工厂。总体来说，开发区的工厂流动率较低，外来人口分为工人与小生意者两大群体。

总体来说，民乐外来人口的生计生活状况与当地的产业发展是分不开的。我们可以从表一、表二中直观看到工厂数量与外来人口数量变化，以此进一步了解两者之间的重要关联。

表一：民乐工厂数量折线图¹⁵



表二：民乐外来人口数量折线图¹⁶



三、民乐外来人口的经济融合

上述表一、表二表明，自 2009 年开始，民乐工厂经过合并、转产形成大规模工厂后，其数量趋于稳定，产业的转型仅带来了 3000 个外来人口的逐渐减少，而近五年来，外来人口流动率极为稳定。据笔者调查分析，一个值得肯定的事实，就是民乐外来人口较好的融合，是其相对稳定的重要因素。对于民乐而言，外来人口与本地人之间融洽的关系，对于当地生产总值、固定的外来人口数量等有着重要意义；对于外来人口而言，能否较好地适应当地关乎着他们的切身利益；对于本地人来说，对外来人口的接纳以及与之良好互动，事关个人以及当地的发展。那么，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多年，民乐的外来人口是如何逐步融合的。笔者主要从

¹⁵ 表一数据来自于民乐村委负责人

¹⁶ 表二数据来自于驻民乐村委流管所工作人员

经济融合以及空间、定居融合层面着手分析。

经济融合包含诸多指标,但在不同研究中指标的选择需要因地制宜。朱力在谈到经济融合时,认为经济融合应当主要强调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中所处的职业地位,以及从事该职业的收入及家庭消费情况。¹⁷结合民乐的特殊性,笔者在本次研究中主要探讨外来人口生计方式的融合情况。

三十多年里,外来人口经济状况越来越好,与本地人共同形成了本地化的经济网络,且因生计、收入、消费而形成的二元差异逐渐被打破。一来,外来人口从事着本地人逐渐退出的支柱产业纺织业相关的工作、从事着满足本地人生活需求的工作;二来,本地人就业以及民乐市场交易网络均趋于本地化;三来,本地人与外来人口有着公平的就业环境,市场政策与本地人均未干扰外来人口的生计与生活。

具体来说,八、九十年代的外来人口主要以纺织工为主,工种包括看纺织机、修机、剪碎布头、验收布、给厂里工人煮饭等。外来人口增速极快,人口剧增的因素主要是老乡关系网络。90年代已基本形成了外来人口主要输出地,包括:广东省省内、广西、湖南、湖北、贵州、重庆、四川等。民乐开发区的形成是民乐当地产业调整的转折点,同时也是外来人口职业流动的转折点及开始打破与本地人二元生计差异的起点。其直接后果是外来人口职业从单一的纺织工人开始了三种转变:一是选择继续从事纺织业;二是在其他行业或是相关行业打工;三是经营小生意。由此,民乐逐渐形成了外来人口职业分化后的两大群体:打工者与小生意者。

第一,打工者群体。2000年前,打工者占外来人口总数的96%,自产业转型后,工人数量逐步减少,现如今仅占61%。产业转型中,丝织业占工业份额减少,而陶瓷业、家具业、五金业略有提升。如今从事纺织行业的工人基本都是80年代就过来打工的。其共性在于:年纪在四、五十岁左右,不愿意或是因没有其他技能而未转行;已经习惯纺织工的生活;家乡发展仍然十分缓慢;民乐的纺织业老板少有拖欠工资情况且收入可观,每个月最少的纺织工人也能拿到3500元的工资,比较高的可以拿到5000元,要是那些修机工少则6000元,多则上万元。事实上,纺织业十二小时工作制加上三班倒,让绝大多数的年轻人望

¹⁷ 朱力. 论农民工阶层的城市适应[J]. 江海学刊. 2002.6

而却步。他们往往选择五金厂、陶瓷厂、家具厂等稍轻松的工厂打工。与此同时，这部分年轻人来民乐却不去都市的理由，主要是“因为广州、深圳那种大城市都需要脑力劳动者。”

第二，小生意群体。外来人口中如今有 39% 的小生意者，涉及各种行业。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旧圩是本地人的售卖市场，外来人口想在这里做生意极为困难。但少部分人开始想办法，在旧圩两端空地上摆地摊，薄利多销，生意极好，这也就是民乐小生意人的雏形。

1993 年，穗丰市场的建立，对于摆街边的外来人口来说是个福音。穗丰市场位于下北街和樵乐路的交叉路口。在 1993 年刚放租的时候，店铺被广东省内的外来人占据。当时本地人看不起这种起早贪黑的服装生意，一百多个店铺，仅两三个是本地人出租的。省外的人在这一时期也极少有做生意的。而到了 2000 年，民乐本地人与广东省外的人逐渐增多，本地人开始做小生意，主要因为见外来人口能够在民乐买地买楼因此认为能够赚钱也开始进行尝试，外省的人则是由于 90 年代末丝织业的更新换代，纺织工人被迫寻找出路时的就业转变。目前本地人与外来人口店铺租用比例为二比八。

在民乐还有一类小生意者——街边水果摊贩。大致始于 90 年代末，樵乐路上的水果摊有近 30 家，有用卡车或是三轮车装着只卖一两种水果的，也有以摊位形式卖十多种水果的，两夫妻闲时轮流忙时共同售卖，经营时间长达 16 个小时，经营者主要来自广西、广东省内，收入尚佳。

此外，民乐还有各类小生意者。纺织业的转型，是外来人口重新选择的契机，决定留在民乐的外来人口集中在这一时期寻找出路。他们选择的小生意主要特点在于：其一，小生意行业涉及民乐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纺织类、餐饮类、装修类、日常生活用品类、运输类等；其二，主要从事某一种生意的，往往都来自同一地方。例如：家具生意、理发行业、小菜馆是四川、重庆的外来人口经营较多；水果摊贩多是广西以及广东省内的外来人口；开小卖部的主要是湖南、广东梅州人；收集废油的主要是广东肇庆人；收废纱、重新加工纱、纺织原料销售的主要是以广西人为主。我们可以看到，小生意者之间互通有无、彼此帮助，老乡网络的地缘性力量在民乐尽显。

我们可以略观一下民乐本地人的就业情况以及市场情况。除个别较富裕村落

年均分红相对较高，多数村落人均年分红在 5000 至 6000 元不等，无法支撑生活所需，同样需要就业。本地人自民乐产业转型后，较少从事一线纺织工人工作，主要从事的职业包括：生意者、散工以及各类管理人员，涉及各行各业，趋于本地化。此外，民乐的交易市场网络同样趋于本地化，几大市场均以满足民乐本地人与外来人口的生活需求为目的。

现如今，无论是本地人还是外来人口，他们都有着相对公平的市场环境，市场政策并无偏袒，例如穗丰市场每五年投标店铺，价格高者得到店铺租用权。三十多年的发展，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共同形成了本地化的经济网络，在相对公平的就业环境中，两者互为服务、彼此需要，逐渐打破了生计上的二元社区。

四、民乐外来人口的空间与定居融合

从空间与定居角度来看。在民乐，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使融合存在可能性。一是因地价不高，无论是租房还是购房均非难事，且落户容易；二是外来人口子女在民乐学习、工作，代际延续使外来人口流动率极为稳定；三是本地人与外来人口交往融洽，友好互助、共同发展；四是外来人口社区参与度高、社会保障意识不断提高。

（一）居住与落户

八、九十年代，外来人口生计、生活空间主要是均匀分布在民乐各条村落的工厂宿舍，外来人口轮班作业与休息，住宿条件极为简陋。2000 年民乐开发区的建立，民乐形成两大生计、居住空间格局，分别是以樵乐社区穗丰服装市场及其临近商品房、村落为中心的生计居住空间和以民乐开发区及其临近村落为中心的生计居住空间。

在居住方面，主要分为三种情况。一是买地或买房；二是租房；三是厂宿舍。首先，外来人口买地买房情况。据流管所的工作人员透露，当前在民乐购房者有 10%。早在 90 年代，民乐第一批小生意者赚钱后为了能够定居，便向村民买地建房，那时候 3 万块钱可以买一块宅基地，建楼落户，这种情况存在三十余户，是最早的安家落户者；1998 年，穗丰市场附近建了商品房：顺发楼，民安楼，民德楼，大多数被附近民乐第三小学的老师买下，少部分被外来人口买下。而到了 2003 年以后，不少小生意者买下这二手房安家落户，现如今这三栋商品房 95%

都是外来人口居住，共计 200 余户；此外，也存在外来人口向村民买村屋的情况，这种情况较少，但也有十余户；当然，因官山城区离民乐十分方便，在官山城区买房者也逐年增多，至少有四十余户。近几年来，随着外来人口的收入逐渐增多，想要在民乐定居的想法越来越强烈，买民乐商品房的外来人口也越来越多。买地买房后，落户的事情就顺利成章，手续简单，不存在任何障碍。

此外，租房居住一般是小生意者或是一家人都在民乐工作。租房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租住村民旧屋，另一种是租住员工村。租住村民旧屋，有的是整租，部分是租几间房间，空间较大，比较适合一家人居住，房租 150-400 元每个月。除个别较富裕村落，民乐开发区附近村落还是有大部分村民仍居住旧屋的，本地人与外来人口混居在旧屋中，彼此见面打招呼，邻里互相帮助，睦邻友好。后者性质类似一个工厂，由老板向开发区租地建房，然后出租给外来人口，环境略差，租金便宜，150 元每月。

最后，民乐的工厂一般都有宿舍。住宿是免费的，还会赠送基本够用的水电费，一般宿舍是六人间，上下床，上铺一般堆东西，下铺用来睡觉；此外还有夫妻房，也可以带小孩子在这里住。

相比而言，民乐本地人除去个别较富裕村落或是小部分较富裕村民在城区买商品房、盖新屋，仍有大量村民居住旧屋，与租住旧屋的外来人口混居，关系融洽。在外来人口进入民乐之后的三十多年里，十分之一的外来人口在民乐买房落户，且数量自 2010 年开始逐年增加。

（二）代际的延续

外来人口子女在民乐能够接受教育、参加工作是民乐外来人口融入当地重要的表现，且是外来人口流动稳定的重要因素。一方面，政策允许外来人口子女在民乐上学，教育问题得以保障；另一方面，市场政策的开放等因素吸引着多数外来人口子女在民乐或是民乐周边参加工作。

从民乐外来人口子女教育来看，近几年来，政策因素加之外来人口对子女教育的重视，大大缩小了与本地子女教育的差距。80 年代第一批民乐的外来人口基本没有将小孩带到民乐上学的，主要由于经济条件不允许、对子女教育重视程度不够以及政策上的不便。90 年代，那部分经济条件稍好的小生意者开始将子女留在自己身边。到了 2000 年后，外来人口子女教育有了翻天覆地的改变，这

种改变普遍存在于民乐外来人口中。他们会缴纳赞助费等供子女上学。2012 年开始，民乐出台了“积分入学”的政策，那部分有固定住址、有合法就业或经营证明的非户籍人士适龄子女可以在当地进行政策性借读，此政策解决了外来人口子女入学难、缓解了赞助费对于一些家庭来说的巨大压力。近几年来，民乐各中学对待本地与外地学生一视同仁，以成绩为评判标准，奖励制度十分完善，一定程度地解决了外来人口子女接受相对公平的受教育待遇的问题。

从外来人口子女参加工作情况来看，最早一批来到民乐的外来人口的子女，无一例外都是在老家长大的，如今这部分子女也已长大成人，选择外出打工，大部分都是在民乐或是民乐周边，从事各行各业。二代外来人口就业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父母在民乐打工的，子女或选择打工或选择在民乐做些小生意，打工一般因纺织业过于辛苦而会选择轻松一些的行业，选择做小生意的话，一般都是用的父母打工攒的钱作为最开始的启动资金；如果父母在民乐做生意且需要帮手的，子女一般也会选择过来帮忙，例如服装行业的小生意者，会再多开一家店，由子女经营，又或者稍大些生意的，帮助父母其中的某一环节；再者，小部分年轻人去到其他地方打工，但多半遇到挫折，几年后仍然回到民乐工作；此外，极个别因在民乐受到不错的教育考上大学，工作去到其他地方，不再继续留在民乐。

本地人的小学、中学教育以及工作情况，基本与外来人口子女一样。两者有公平的受教育机会、平等的教育环境、教育资源；本地的年轻人，除去那部分去城区工作的，其余年轻人也与外来人口年轻人一样在相对公平的求职环境下就业。

（三）交往圈

从外来人口与本地人交往角度出发，外来人口与本地人之间彼此关系得到显著改善。本地年轻人对外来人口不存在偏见，中老年人过去根深蒂固的偏见逐渐减少甚至不复存在；而外来人口也不再对本地人产生地域优势、不劳而获的偏见。

外来人口平日交往的对象主要是老乡，老乡之间会形成类似互帮小组，工作、生意、生活上都会相互照应，他们往往愿意租房租在邻近的地方，过节的时候会各家出几个菜，一起简单庆祝一下，喝酒、聊天、打牌等都是彼此交往的休闲方式。

生活在民乐的外来人口避免不了与本地人之间的接触。在八九十年代，外来人口与本地人交往甚少，唯一接触的机会就是和自己的老板，如果遇到了好的老板，在伙食、工资、住宿条件上都会好一些，并且也会时常关心下自己的工人。但那时候，本地人对外来人口总体印象是：不讲卫生、不懂得交通规则、会有偷盗行为等，加之本地人天生的地域、身份、经济上的优越感，略有轻视外来人口之嫌，“山仔”、“外地佬”、“捞佬”等都是当时对外来人不尊重的大呼。称呼。

进入 2000 年以后，民乐的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彼此的关系有了极大的改善。本地人之所以改变看法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其一，在过去，本地人一向看不起外来人口做服装鞋包小生意，总觉得这种小生意赚不到钱也很辛苦。但到了 90 年代中期，从事这种小生意的部分人，在民乐买地盖楼或是购买了商品房，也有不少人在官山城区也买了商品房。本地人开始逐步了解这个行业，并且开始转变对待从事这部分行业外来者的看法，并且加入到服装行业中去。其二，本地人对外来人口的依赖极强，外来人口充当着消费者以及生产者，为民乐的产业以及本地居民的生活作出了重要贡献。与此同时，外来人口对本地人的看法也产生了一定的变化。过去外来人口认为本地人凭借地域优势，可以生活得不错，普遍比较懒，但近些年通过与本地人相互接触，逐渐了解实情，发现他们也在为自己的生活而努力工作，逐步改变了过往偏见。

（四）社区参与、社会保障融合情况

民乐近几年来逐渐重视社区建设，2013 年，民乐村委成立社工互助社并向某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购买驻村社工任职，配备专职社工加入工作。该社工互助社从社区实际需求出发，开展形式多样的小组、社区、探访活动，切实服务辖区村民、外来人口。社工互助社开展多种针对外来人口困难户的探访活动、外来人口青少年的手工、游园等小组活动与社区活动等，其宣传力度较大，受益外来人口家庭颇多。社工工作人员表示愿意继续努力让更多外来人口家庭进一步了解机构并参与进来。此外，社工互助社也致力于促进本地人与外来人口共同参与的亲子活动，促成两者之间的交流与互动，活动反响很好。

在社会保障方面，外来人口购买社会保险意识逐渐增强，有的家庭即使生活不大宽裕，但也至少会有一人买社保；那部分生活条件还可以的家庭，夫妻双方都有缴纳。本地人则基本都缴纳社保，公认其为惠民政策。

综上，笔者描述了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居住与落户、代际延续、本地人与外来人口交往情况以及社区参与、社会保障情况四个方面情况，清楚看到三十多年中，“二元社区”被打破，逐步走向“融合”。

五、小结

基于对民乐的个案分析，民乐外来人口融合主要体现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实现了经济融合，形成了本地化的经济网络。一方面，外来人口从事着与本地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工作，外来人口是民乐第二、第三产业重要贡献者，小生意者从事着服装售卖、卖水果、小卖铺、开摩托车、收购废品、卖纺织产品原料、理发店等满足当地人基本的生产、生活服务；另一方面，本地人的就业以及市场交易网络均趋于本地化。两者共同构成了彼此需要、互为服务的关系。假使没有外来人口，民乐的纺织业支柱、诸多服务行业就会出现瘫痪，而没有本地人，外来人口的生计则无法正常进行。

第二，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实现了空间与定居融合，三十多年来，户籍政策、教育政策、市场政策的惠及，越来越多的外来人口能够逐渐与本地人共享相对公平的居住、教育、生计的竞争环境，两者的差距正在不断缩小。

第三，外来人口从事着与支柱产业丝织业相关的工作。无论是打工者，还是小生意者，他们中大部分人都从事着与纺织业相关的工作，纺织业虽然略有萎缩，然而却仍然是民乐的支柱产业，支撑该支柱产业的便是一万多个外来人口，他们扛起纺织业的大旗。相比而言，本地人却逐渐从纺织业撤退，从事各行各业。

第四，外来人口流动呈现稳定局面。近几年来，稳定的流动率，是民乐的福音，是政策性、制度性、经济因素以及多种主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代际的延续，外来人口子女能够在民乐学习与工作更是外来人口流动稳定的重要因素。

基于上述融合特征的形成，我们认为其主要的融合机制的基础是村中城这一半城市化类型的特征，即在珠三角乡村都市化过程中，存在大量处在城市圈连接地带或是边缘地带的区域，这些区域经历了从改革开放后自发形成的遍地开花、自下而上的乡村城镇化到集中规划、自上而下的转变，并且在产业转型、城市化发展模式转变之后，形成了地方上内聚的经济网络、稳定的空间格局以及传统主义的社会整合体系。在这样的基础之上，融合才有了可能：一是政府政策扶持，

包括户籍政策、市场政策。政府多项政策对民乐外来工的优惠，吸引着外来工的生活、生计、定居。二是企业老板利用福利维系以及高度诚信。企业老板用多元化福利吸引着大量外来工从业，并且以从不拖欠工人工资的诚信口碑深得外来工的认可。三是外来人口与本地人之间在经济、生活、居住空间上形成了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四是本地人的接纳以及外来人口的主动融合。

综上，民乐外来人口研究有着重要的研究意义。今日的中国，流动性极强，存在大量新移民，新移民的适应问题值得关注，诸多研究表明外来人口融入当地存在困难，与本地人之间形成明显的“二元社区”。但在民乐这样的村中城里，生存着大量的外来人口，在经历了三十余年的风雨后，其流动呈现稳定局面，并且外来人口能够较好地融入当地。本地人与外来人口之间的差异逐渐缩小，从原本制度性差异、社会分层差异逐渐向仅存在因地域造成的身份差异转变，而定居的增多甚至逐渐减少了这种身份差距。从这个角度出发，本文的研究意义在于：其一，在新移民如何能够融入当地存在一定的研究价值，可以以此为例进一步思考移民城市中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形成的“二元社区”走向“融合”的可能路径；其二，乡村都市化的结果不是造就了一批毫无秩序的半城市化地区，在社会结构转型上是有示范意义的。

参考文献：

- 【1】仲大军. 国民待遇不平等审视——二元结构下的中国[M].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2.
- 【2】周大鸣. 外来人口与“二元社区”——珠江三角洲的考察[J]. 中山大学学报, 2000(2).
- 【3】骆腾. 冲突中的调适 :城市二元社区新探 ——基于东莞市增埗村的实证研究[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2）.
- 【4】周大鸣. 城市新移民问题及其对策研究[M].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4.5.
- 【5】周大鸣 杨小柳. 浅层融合与深度区隔[J]. 民族研究, 2014(2).
- 【6】李培林. 中国农民工社会融合的代际比较[J]. 社会:2012.5(32).
- 【7】朱力. 论农民工阶层的城市适应[J]. 江海学刊, 2002（6）
- 【8】崔岩. 流动人口心理层面的社会融合和身份认同问题研究[J]. 社会学研究 2012(5).
- 【9】米庆成. 进城农民工城市归属感问题探析[J]. 青年研究, 2000（4）.
- 【10】张文宏 等. 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合的结构、现状与影响因素分析[J]. 社会学研究,

2008(5).

【11】张斐.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J]. 人口研究, 2011, 35 (6) ..

【12】吴文恒. 中国渐进式人口市民化的政策实践与启示[J]. 人口研究, 2015,39(3).

【13】叶鹏飞. 农民工的城市定居意愿研究——基于七省（区）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J]. 社会, 2011(2).

【14】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南海市西樵山旅游度假区志. 广东省出版集团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8.

【15】朱力. 论农民工阶层的城市适应[J]. 江海学刊. 2002.6